

# 理性抉擇理論在政治學運用之探討

盛 治 仁\*

- 一、前言
- 二、理性的假設及其運用
- 三、理性抉擇模型的批判與討論——過度簡化的模型、不切實際的假設、不合理的結論，無法測量觀察的均衡、事後修正，以及範圍不確定
- 四、理性抉擇在政治學運用的探討之一——以政黨競爭為例
- 五、理性抉擇在政治學運用的探討之二——以投票率為例
- 六、結論

理性抉擇是近年來政治學界的顯學，被廣泛地運用在諸如國際關係、談判、投票行為、集體行為、立法政策、以及政黨競爭等領域，也佔了重要期刊高比例的論文刊登篇幅。在這個研究方法重要性逐漸增加的同時，也有了批判的聲音陸續傳出。有學者質疑到底人們做決定時究竟是不是經過理性的思考，也有學者認為理性抉擇的相關模型對學界了解政治行為並無實質幫助，而且對很多現象都無法提供合理的解釋。這些批評有誤解、也有切中要點的地方。本文希望整理出學界對理性抉擇途徑的主要批判與回應，並且嘗試以兩個議題，政黨競爭和投票率為例，來突顯理性抉擇研究方法在政治學運用上的貢獻與限制。作者認為，理性抉擇途徑在學界研究政治行為上，有其獨特的貢獻，但是同時也有應用領域的限制。未來發展的方向不在於辯論政治是否為理性，而在於找出哪些領域較適合或不適

---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esheng@seed.net.tw

投稿日期：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接受刊登日期：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東吳政治學報/2003/第十七期/頁 21-51

合運用理性抉擇的模型來幫助我們進行研究。

關鍵字：理性抉擇、政黨競爭、投票率、理性假設。

## 一、前言

近二十年來，理性抉擇（*rational choice*）的方法與模型在政治學的許多領域裡被廣泛運用，使用理性抉擇方法的期刊論文在美國著名期刊的比例亦大幅增加。根據學者的計算，以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為例，在一九五二年時，完全沒有理性抉擇的相關論文，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理性抉擇的相關文章佔了該期刊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數量（Green and Shapiro, 1994: 3）。這樣的驚人成長速度，顯示了理性抉擇的研究方法在政治學界的上升份量。而根據較新的統計數據，在國際安全的領域，以七種期刊從一九九四到一九九八年論文數量來看，在 543 篇論文中，有 71 篇是運用特定數學模型來推導結論的理性抉擇文章，佔 13.1% 的比例（Martin, 1999）。<sup>1</sup> 在政黨政治的部分，以 *Party Politics* 期刊為例，該刊物從一九九五年創刊至二〇〇一年底，有 6.8%（13/189）的論文應用理性抉擇方法。<sup>2</sup> 這些數據都顯示理性抉擇的研究方法在政治學的研究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sup>3</sup>

但是這些份量上的成長，並不完全代表其在政治學界的影響力，理性抉擇反而成爲政治學方法論上一個爭議的焦點所在。究竟政治可不可以用數學方法來作研究？我們的研究學門，到底是「政治學」或是「政治科學」？人們在作決定時，是否是「理性」的？這種種爭議，近年來常以不同的形式在

- 
1. 七種期刊包括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Security Studies*, 以及 *World Politics*. 而其結論中 13.1% 的數字，是由於有兩份期刊（*International Security* 和 *Security Studies*）共 218 篇論文完全沒有採用運用理性抉擇方法的文章。
  2. 這個數據是由該刊物總編輯，Kenneth Janda（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直接提供給作者。
  3. 這些較近的數據雖然顯示理性抉擇文章在比例上不如 APSR 的早期數據，但並不表示其重要性在下降中，因為在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的領域裡，理性抉擇方法在應用上本來就低於 APSR 較重視的美國政治領域。作者引用這些數據的目的只是為了顯示理性抉擇研究方法在美國政治學界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不同的地方論辯。因此作者希望以理性抉擇作為運用在政治學上的一種研究方法之定位，來討論其運用上的優點與限制。因此本文的目的及範圍，不在於討論政治學方法論哲學層次的辯論，或涉及「政治學」和「政治科學」定位的爭辯。這方面的討論，在國內外均有文獻可供參考（Almond, 1977; Moon, 1975; Waldo, 1975; Riker, 1990; Lowi, 1992; Simon, 1993; Goodin and Hans-Dieter, 1996；吳玉山，2000；袁頌西，1981；徐振國，2002）。作者也不試圖對理性抉擇理論的源起作介紹或對次領域內重要文獻的論點與貢獻作整理，而是希望以應用理性抉擇方法最廣最深的美國學界對理性抉擇作為研究方法本身的優點與限制的論辯作為出發點，整理出美國學者對這些問題的正反面論述，再以作者個人的觀點來探討從這些面向來看，究竟理性抉擇方法在政治學上運用的優缺點為何。<sup>4</sup>

本文所探討的理性抉擇定義，是我們在進入實質討論之前應該要界定的問題。作者希望從兩個層次來看，第一是如何界定一篇論文是否運用「理性抉擇」方法，其次則是理性抉擇的共通假設有那些。可惜的是，這兩個問題恐怕都沒有明確的界限可循。

首先是文章性質分類的問題，要界定一篇文章是否運用理性抉擇方法，牽涉到要以概念的運用或是內容上使用數學方法的程度為分類標準，而學者

---

4. 有評審建議作者納入台灣學界對相關問題的討論，以免創造出「進口的假對話」。但是由於一方面國內既有文獻的討論較偏重在政治學方法論及學科定位上的論辯，另一方面從理性抉擇方法本身在應用時的基本假設和相關優缺點來看，並無明顯的外來/本土論述差異，因此作者在本文的討論還是以美國學界的相關論述為主要的出發點。作者以「理性抉擇」和「理性選擇」作國內期刊論文篇名、關鍵字以及摘要的搜尋，分別找到 16 篇及 28 篇論文。其中除了少數已為作者引述關於方法論討論的文章之外，其餘多運用理性抉擇途徑討論多個不同領域的研究問題，如新制度論（陳敦源，2001）、行政革新（吳秀光，1998）、議題投票（謝復生、牛銘實、林慧萍，1995）、為何投票（陳敦源，2000）、集體政治暴力（傅恆德，1993）、中國政治研究（何高潮，1995）、教育政策分析（黃乃熒，1994）、政策分析（李允傑，1996）、犯罪學（張漢音，1993）、馬克思主義（黃瑞祺，1992）、美國台海政策（蔡政論，2000）、中共留學生政策（吳宗憲，2000）乃至於寡婦守節（張彬村，1999）等問題的研究。由於這些研究皆為以理性抉擇方法實際運用於不同領域的研究問題，因此不易在現階段對該途徑在國內的運用狀況做系統性的討論。

往往有不同的標準，而且寫作者的看法也不一定與閱讀者相同。例如當 Simon 抱怨 Lowi 將其論文誤歸類為理性抉擇文章時，他同時也將 Green 的論文誤歸類為理性抉擇文章（Green and Shapiro, 1994: 2）。這當中的困難在於有些使用數學工具來演算或推論的文章，作者本身並不接受理性抉擇理論的前提，因此她們的文章或許在外觀上有數學符號，但是寫作者本身並不認為其文章應該被視為理性抉擇理論的運用。在學者作實際文章歸類統計時，有人以「使用數學模型並推論均衡解」的條件來作為分類標準（Walt, 1999; Martin, 1999）。究竟應該以概念的運用或是數學模型使用的多寡為依據，實際上並無定論。

在共通假設的部分，學界對於「理性抉擇」的定義，雖有大致的共識，但是對某些假設還是有不同的看法（Green and Shapiro, 1994: 14-21）。一般都同意當一個決策者在其所擁有的資訊下，去選擇達到其目的的最有效方法，是為「理性」行為的定義（Olson, 1965）。而對這個最有效率的方法，在選擇時也涉及極大化（maximization）的過程，亦即決策者會在可能的選項中，選擇使自己得到最大預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的途徑。在不確定性的環境下，行動者無法確知其行為的必然結果，因此必須對未來作一些假設，並在這些假設之下去估算各項可能選項的預期效用，並選擇能夠極大化其預期效用的選項（Elster, 1986; Harsanyi, 1986）。理性的內涵通常也包含一致性（consistency），表示決策者在相同的情況下，會作出同樣的決定，否則無法建構出可推論的結論（Rothschild, 1946）。一致性還包含遞移性（transitivity），意味如果行動者在偏好順序上喜好甲多於乙，又喜好乙多於丙，則必定喜好甲多於丙（Arrow, 1951）。而「個人」則是理性抉擇分析時的單位，集體行為只是個人極大化自己預期效用時的結果（Riker, 1990）。以上這些假設都是理性抉擇理論一般共同接受的假設，可以為我們後續的討論界定範圍。

如前所述，學界對理性抉擇的在政治學領域的研究上，有許多的討論。先撇開對特定議題或領域的零星討論不談，Green 和 Shapiro 在一九九四年出

版的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一書中對理性抉擇在政治學的運用做了系統性及全面性的批判。他們挑選了投票決定 (turnout decision)、集體行爲 (collective action)、立法政策 (legislative policy making)、和政黨競爭 (party competition) 等美國政治學界中大量運用理性抉擇方法的相關研究作為分析標的，對於理性抉擇在政治學上的運用，提出了下列主要的批判觀點。

- 第一、理性抉擇的理論常是事後諸葛，只能設法對已經發生的現象提供解釋，並常會改變自己的模型以求符合現實狀況。
- 第二、理性抉擇理論提出來的均衡 (equilibrium) 結果常是無法測量與觀察的。
- 第三、理性抉擇理論可運用的範圍由研究者自由心證決定。<sup>5</sup> 能夠解釋的地方就運用，無法解釋的領域就認定不適用，毫無規則可循。而且理性抉擇學者常常選擇性找尋可以提供其模型佐證的證據，而刻意忽略與其模型推論結果不符的實證結果。

除了這些批判之外，理性抉擇模型常被批評的項目，還包括對「理性」觀念本身的質疑、對假設不切實際的批評、以及對不合理結論的攻擊。這種種的質疑，對我們理解理性抉擇理論運用在政治學的研究上，提供了討論的切入點。因此作者希望藉由對這些面向的討論，來探討理性抉擇在政治學界運用的優缺點。在探討了這些批評和回應之後，作者以政黨競爭和選民投票與否兩個研究問題為例，來探討理性抉擇研究在政治學上的貢獻和其面臨的限制。

對於理性抉擇研究方法的種種批評與質疑，作者認為其中有一些批評直擊要點，確實指出了理性抉擇這個研究方法的問題所在；但是另外則有一些質疑是對該方法理所當然地推論、誤解而產生。接下來我們將分別針對理性抉擇理論作為研究方法本身最常被討論的幾項優缺點，從不同面向進行討論。

---

5. Green 和 Shapiro 稱之為 Arbitrary Domain Restriction.

## 二、理性的假設及其運用

人們在做政治決定的時候，是否真的會經過「理性」的思考過程，是外界對理性抉擇模型的一個常見質疑。而偏好順序的設定，經過了心理學者的實驗設計研究發現，由於受到框架效果以及情境的影響，民眾即使在經濟消費的相關事務上，都會出現非理性（irrational）以及不一致（inconsistent）的行為（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1984）。這些研究者運用許多不同的情境以及框架效果，證明民眾的偏好順序並不符合「理性」的假設。舉例而言，Quattrone and Tversky (1988) 在實驗中顯示隨著參考點（reference point）的不同，民眾支持的候選人和政策會有所改變。民眾在做選擇時，對「避免損失」的重視甚於「追求所得」，而且對效益期望值的計算方式，也並不如理性抉擇模型的公式所預測一般。這些實驗重複證明民眾的偏好順序以及對預期效用的期望值計算並不符合理性抉擇的假設。如果人們在對經濟相關事務的考量都無法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政治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的推廣運用上會有更大的問題，因為一方面行為者受到認知能力的限制，無法做出完整的計算，另一方面人的行為有許多非理性因素干擾，例如利他、寬恕、健忘等特質（石之瑜，1999），因此用「理性」的假設來分析政治或社會現象是大有問題的。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觀察，認為理性抉擇對民眾算計思考能力的要求過高，並且指出人們的行為不見得都是為了達到目的之工具性作用（Abelson, 1996）。

這樣的質疑，對理性的定義及其運用並不完全公平。首先、理性抉擇理論對理性的要求並不如想像中的高。一個「理性」的人做決定，並不代表他的每一個動作都必須經過縝密的推算，或是其最終的決定就一定對他最有利。理性的要求只在於行動者知道他自己的偏好順序，並且在其所具備的資訊下，會選擇最能夠幫他達到目的的策略。舉例來說，有人喜歡結果A甚於結果B，而且知道採取策略甲會導致結果A，而策略乙會導致結果B。在這種

情況下，理性的決策者會採取策略甲，而不會去採用策略乙。在這種定義下來看，所有的政治分析也都有其理性抉擇的成分存在，因為分析者都假設其分析單位，不論是個人或機構，都會採取有助於其達到目標的做法，不管這個目標是出自於單純的利己動機或是含有其他因素如利他的考量等。換句話說，理性抉擇並不假設人們的動機和偏好都是出於自利的考量。如果行動者不是理性的話，所有對其行為的分析，不管採用何種研究方法都失去了意義，因為行動者的決策模式沒有規則可循，如果不是隨機選擇，就是會選擇自己較不喜歡的結果，會形成一種更不合理的現象。

其次，或許有人會質疑人們的思考並不能以二分法，「理性」或「不理性」兩種可能來涵蓋。在很多情況下，人們的思考可能是「非關理性」。換句話說，人們並不會做縝密的思考後再做決定，或是在作決定時含有感情和習慣的成分存在。對於這種看法，確實理性抉擇的模型假設在某些條件下會比在其他環境適用，本文後續會再詳加說明。而感情與習慣的運用，一方面可以內含在模型的架構裡，另一方面如果這些運用感情和習慣所做的決定如果確實不符合行動者的利益，正是理性抉擇模型可以提供作為改變行為模式的切入思考點。選民在某些框架下會做出不同的決定，只是反應了其對不同參考點的認知差異，一旦這些差異被選民所了解，其行為上的差異也應該會消失。

再者，理性並不表示人們不會犯錯。在有限的資訊下，行動者對自己的行為所產生的後果可能會有錯誤的判斷，而現實世界也有程度不一的風險性（Morrow, 1994）。因此，理性的人也有犯錯的機會。但是隨著行動者資訊越趨充分，並且能夠從過去的嘗試錯誤經驗中學習，就會逐漸降低犯錯的機會。

上述的解釋，並不是要忽略心理學者實驗的結果。這些心理學的實驗結果，確實指出了許多理性抉擇理論者視為理所當然之假設的缺失。但是我們認為這些實驗結果反而更進一步地幫助了理性抉擇理論的發展，讓設計模型者回頭檢視並改善其對理性定義不夠周延之處，並了解其理性假設最適合運

用及不適合運用的領域。舉例來說，在認知到人們會有規避風險（*risk averse*）的傾向之後，如果研究者認為這個傾向符合當下研究問題的情境時，其理性抉擇模型可以假設效益函數是向下凹陷（*concave downward*），來捕捉這個特性。規避風險、相對於追求風險（*risk seeking*）與風險中立（*risk neutral*）兩種特質，指的是當行動者在面臨預期效用相當的選擇時，會傾向選擇變異較小的選項。舉例而言，如果有兩個選擇，甲選項是一定可以拿到 100 元（結果確定、變異較小），乙選項是必須在兩個密封的信封中隨機選擇，一個信封有 200 元，另一個信封則是空的（結果變異較大）。規避風險的行動者會選擇甲選項，具備風險中立特性的行動者會選擇乙選項，而追求風險的行動者則覺得甲和乙兩選項之間無差異。這種規避風險的特性如果顯示在效益函數的圖形上，會呈現向原點凹陷的圖像（在數學上的理由，是因為這個函數的二次微分會小於零<sup>6</sup>），因為對規避風險的行動者來說，確定結果的效用大於兩個不確定選項的預期結果。以上的例子說明了由於心理學者實驗的結果，讓理性抉擇運用者了解到理性抉擇理論假設的不足，並且以不同假設來建構不同模型的過程。

另外人們對期望效益的計算，常會視不同情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並不能像數學公式般的一體適用。這些研究發現，也能夠讓理性抉擇研究者更深入思考其模型較為適合運用的範圍，例如 Satz and Ferejohn（1996）認為理性抉擇模型較適合運用在行動者選擇有限的情況下，並且相對而言，在經濟學上的運用解釋公司而非消費者的行為，在政治上較適合解釋政黨而非選民的行為。而 Chong（1996）也指出，雖然理性抉擇的模型在預測未來行為的表現尚比不上對現有狀況的解釋，但是在解釋行動者之間的策略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選擇上卻有極大的解釋力，並且提供學界優於其他研究典範的解釋理論。換言之，理性抉擇理論，像任何其他理論一樣，有其限制和貢獻，

---

6. 在微積分的計算裡，一次微分的正負號能夠顯示出該函數為上升或下降的趨勢，而二次微分的正負號則顯示出該函數是向原點凹陷或向原點凸出。

也有其較為適用的領域。對於這方面的討論，我們稍後會做進一步的探討。

### 三、理性抉擇模型的批判與討論——過度簡化的模型、不切實際的假設、不合理的結論、無法測量觀察的均衡、事後修正，以及範圍不確定

理性抉擇模型常被批評的另一個面向是其過度簡化現實狀況，做出太多不切實際的假設、常推論出與事實不符的結論，並且無法測量或觀察均衡解。事實上，理性抉擇理論之外的所有的解釋和模型也都是對事實的一種簡化，只是簡化程度不同的差別，因為沒有任何理論「能夠」或是「希望」複製現實的所有狀況。理性抉擇模型相對來說，對於現實簡化的程度大於其他的理論途徑，而這也同時構成了其優缺點。這樣的簡化，讓研究者可以建構簡潔（parsimonious）的模型，並獨立出重要變項的影響力加以探討。理性抉擇模型中常用的靜態比較（comparative statics），探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ceteris paribus），兩個變項之間的互動關係為何。但是過度的簡化，又可能讓模型因為悖離現實，以致於得到與現實不符的錯誤推論。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注意到理性抉擇模型的優劣差別極大。好的理性抉擇模型經過適度的簡化，以簡要的變項抓住問題的精髓，讓研究者得到關鍵性的深入見解。不好的理性抉擇模型因為悖離現實狀況或是沒有掌握關鍵因素，因而推導出不合理的結論。因此我們在檢驗批判理性抉擇理論時，有必要區別相關模型的品質，不能誤將不好模型的缺失作為理性抉擇方法本身的缺陷。

至於對上述的靜態分析，也有學者表達不同的看法。論者有時批評在現實的世界裡，所有情況都隨時在改變，不會有「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因此這種靜態比較是沒有實質意義的。這種批評導因於學者對做出「其他條件不變」假設的目的不同所致。運用理性抉擇方法的學者希望用這樣的討論能夠將變項之間的關係獨立出來探討，看看當變項 X 增加或減少時，對變項 Y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而批評者期望以模型作為現實世界的縮影，而在現實世

界裡，變項 X 如果改變，一定也會同時牽動變項 W 和變項 Z，況且變項 U 也持續在變動中，因此對變項 Y 的影響不但無法獨立探討，而且其推論還可能不符合現實狀況。這是對靜態分析的期望不同所造成的落差。換言之，靜態比較分析在了解變項之間的互動關係上有其貢獻，但是不見得能夠精準反映出在現實狀況中，單一變項變化時對整體狀況的影響。

另外一個對於理性抉擇假設的辯護，其論點為觀察重點不在於模型假設是否合理，而在於結論的推導「結果」是否符合現實狀況。Milton Friedman (1953) 指出，評斷一個理論的標準不在其假設的真實性，而在於其預測的準確性。舉例而言，經濟學的分析多以擁有者或經營者希望追求最大利潤為假設，進而建構許多模型來預測或解釋經營者的行為。但是 Richard Lester 針對公司擁有者及經營者的研究卻發現，其中多數人的營運目的不在於追求最大期望利潤 (Hausman, 1992: 159)，顯示這個建構許多經濟模型的重要假設和實際狀況並不完全吻合，但是卻無礙於經濟學模型對相關事物的解釋和預測能力。築基於這個假設的眾多經濟學模型仍然提供了經濟學者了解相關行為的解釋理論。換個角度來看，如果一個模型的假設完全符合現狀，但是卻無法對結果提供合理解釋，該模型的實用性可能會受到更大的質疑。這種說法完全以工具主義的角度來看待並檢驗理性抉擇模型的實用性，在論理上無法令人完全信服。另外一種看法，也是作者較為傾向支持的說法，則是假設的合理性也是檢驗模型的重要依據之一，而至於模型推演結果是否真能符合現實環境並加以解釋及預測，則還會受到許多不可抗拒因素的影響，不完全是模型假設的問題 (Friedman, 1996: 12)。

至於如果理性抉擇模型推導出不合常理的結論，這種出人意外的結果可能是理論上突破的重大發現，但更多時候是由於模型本身的問題導致，面對的方式應該和其他研究方法處理類似問題時一樣。首先研究者要思考模型的設計和相關假設的正確性，再檢驗推論的過程和邏輯有無錯誤，有沒有遺漏重要變項未予納入，最後則考慮是否相關行動者未能正確認知自身利益所在而做出誤判的選擇。在這樣的修正思考過程中，就幫助了研究者更深入地去

分析研究問題，對促進相關問題的了解有莫大的幫助。當然還會有遇到模型本身的建構似乎沒有問題，而結論卻與事實有差距的情形，就像選民是否該去投票的問題，作者會在後續的段落裡再進一步加以討論。

再者，則是對於均衡解經常無法被測量觀察的批評。這個問題和前述的靜態分析與模型假設的真實性有關聯。如果模型的目的是要複製並預測真實世界的情形，則模型的均衡解能否被測量或觀察就是一個重要的評斷標準。但是如果研究者的主要目的在於了解變項之間的互動關係，模型均衡解的真實程度就沒有那麼重要。Friedman (1996) 以 Olson 提出的團體理論集體行動 (collective action) 邏輯為例來說明均衡解的真實性是否重要。Olson (1965) 指出，由於在大團體中可以有搭便車 (free-ride) 的行為，民眾可以讓別人盡義務，而自己也跟著享受成果。如果缺乏一個選擇性誘因 (selective incentive) 的機制，來排除掉沒有盡義務的人享受成果的機會，會使得在大團體中沒有人願意參與集體行動。換句話說，Olson 對於缺乏選擇性誘因機制的集體行動之參加人數均衡解為零。

但是事實上，任何的集體行動，不管有無選擇性誘因，其參加人數都不見得為零，Olson 的均衡解在實際情況是觀察不到的。這可能是因為有利他 (altruistic) 或無知 (ignorant) 的民眾，或是 Olson 的理論無法普遍運用在所有類型的人身上。Olson 也特別討論了「非經濟性遊說」和「低度理性的團體」等，認為對這些團體來說，心理學和社會學角度的分析會比經濟學角度的分析來的恰當。從這個例子來看，有兩方面的推論。第一、即使均衡解在現實世界並不存在的狀況下，並不表示理性抉擇的模型就沒有參考價值，必須要看研究的目的和推論過程的邏輯來衡量一個模型的價值。總的來說，Olson 的模型還是提供了研究者了解集體行動的重要理論基礎。第二、理性抉擇理論的運用確實有其限制。如何找出其相對較為適合的領域並了解其應用上的限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本文也會有後續的討論。

另外，一個批評是理性抉擇的研究者，經常是看到了現實的狀況後再建構模型加以解釋，因此在設計上會讓其模型預測結果符合現實狀況，這就像是統計上先有資料再畫上符合的曲線以建立理論（*curve fitting*），並不是好的理論建構途徑（Green and Shapiro, 1994: 35）。當理論是以後見之明在事後拼湊時，這些理論的假設通常都無法經得起事實的考驗。

對於這種批評，回應者認為「事後建構理論」（*Post Hoc Theory Development*）的另一種說法是「拼圖解惑」（*puzzle-solving*），是經驗政治裡極正常的途徑（Kuhn, 1962）。學者們通常都是看到了一個未被解釋的既存現象，進而希望建構出一套理論架構來解決此問題，不可能有理論導向的模型完全獨立於現實狀況之外而存在。因此理性抉擇模型問題不在於事後建構的特性，而在於其能否發展出可供實證檢驗的假設，並建立一套辨明真偽的標準。

最後，理性抉擇研究者常宣稱其理論應用性之廣博，可以用來解釋所有的社會現象。但是當他們面臨無法解釋的現象時，則會將其排除在運用範圍之外。Green and Shapiro（1994）指出這種獨斷的運用範圍限制（*arbitrary domain restriction*），並舉出 Posner（1985）對刑法的研究為例（Green and Shapiro, 1994: 44）。Posner 以極大化財富作為基本假設來解釋刑法的演變，但是他無法解釋為何刑法要處罰無被害人的犯罪，例如賣淫和吸毒等行為。因此這是一個典型的「能解釋就解釋，不能解釋就說不適用」的做法，讓理性抉擇模型的運用範圍成為研究者主觀認定的標準。

針對這樣的批評，事實上，任何的理論模型都有其限制，任何的定理也都會有例外的地方。理性抉擇使用者大概也不會天真到認為其理論可以解釋所有社會行為。因此，理性抉擇學者，像其他領域的學者一樣，都必須要能夠較清楚地界定其模型能夠適用的範圍，並進一步研究為何在某些範圍或條件下無法適用的原因。

除了以上對理性抉擇方法本身的質疑之外，也有批評者認為在效果上，理性抉擇的相關模型都只是告訴我們一些已知的現象，並未增進學界對政治

領域與行爲的了解。而且理性抉擇領域的學者所結合的社群，由於方法上的隔閡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排他性，使得這些研究結果無法和外界產生對話。所以在方法論上的精進和複雜化反而可能會帶來該研究方法的衰微。針對這些批評和質疑，作者希望以政黨競爭和投票率兩個議題為例，來探討理性抉擇理論在政治學運用上的貢獻與缺點。

#### 四、理性抉擇在政治學運用的探討之一——以政黨競爭為例

首先我們看的例子是運用在選民投票行爲研究的空間理論（spatial theory）。選民投票行爲的空間模型源自 Hotelling（1929）研究在一條街道上，兩家互相競爭的商店應該如何選擇自己的營業地點，以得到最多的顧客。而 Downs（1957）把這個模型運用在政黨之間的競爭，把地理的距離轉化成意識型態的空間，來解釋並預測政黨爲了得到最多的選票支持，會採取什麼樣的定位策略。這些分析的基本假設是消費者或選民在選擇商店或候選人時，考慮的標準是這些商店或候選人和選民之間的距離遠近。在分析過程中，簡化了候選人之間的差異、個人魅力以及商店之間的服務品質等因素，純粹以彼此距離空間的遠近差異爲唯一的考量，因此被稱爲空間理論。

Downs假設在  $[0, 1]$  的單維空間<sup>7</sup>上，選民平均地分布，而政黨可以自由地採取不同的政策以贏得選民的支持。選民則被動地支持離自己的立場最接近的政黨。Downs的研究主要專注在兩黨政治的情況，而Eaton and Lipsey（1975）則將其模型推廣到多黨競爭的情形。他們有下列的基本假設：

（一）政策空間在【0，1】的數線之間<sup>8</sup>

7. 單維空間是一個簡化的假設，意指政黨或候選人競爭的議題可以簡單化約在同一個面向上，例如自由/保守或是統一/獨立。

8. 這個假設一方面是上述單維空間的特性，另一方面則將範圍限制在 0 到 1 中間，以簡化討論過程中所牽涉到的數字。事實上，這個區間可以作任意的變動，並不會影響到後面的推論。

- (二) 選民的理想政策<sup>9</sup> 立場在【0，1】之間平均分佈
- (三) 選民投票給最接近自己政策立場的候選人
- (四) 政黨可以自由地在【0，1】之間移動位置
- (五) 政黨移動位置時，假設其他政黨的位置是固定的，並不會做相對應的改變（此假設稱為 Cournot-Nash 假設，意指假設在賽局中的另一方策略為固定的，並未隨著自己策略改變而作相對改變的情形）。

在他們的模型裡，政黨的得票是該政黨和左右相鄰政黨中點（midpoint）之間的選票，如果某政黨沒有左邊或右邊的相鄰政黨，則該政黨為邊緣（peripheral）政黨，得到其左邊或右邊的所有選票，加上和其相鄰的另外一邊政黨中點之間的選民支持。如果一個政黨左右都有相鄰政黨，則該政黨稱為內部政黨（interior）。在這些條件下，Eaton 和 Lipsey 整理出從一黨到多黨的競爭均衡解。

如果只有一黨壟斷，則該黨在任何位置都無所謂，都能得到所有的選票。在兩黨競爭時，雙方都會集中在 1/2 的位置，各分得 1/2 的選票。在三黨鼎立的時候，沒有均衡點。因為被包夾在中間的政黨，其選票會被兩邊的政黨掌握，因而會向邊緣移動。而留在中間的政黨又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再向外移動，因而造成沒有均衡點的一種循環。在四個政黨競爭的情況，則會出現兩個政黨集中在 1/4，另外兩個集中在 3/4 的位置。至於五個政黨的情形，則會有兩黨集中在 1/6，一黨在 1/2，另外兩黨在 5/6。六個政黨時，就會有多組的均衡解，其中一例為兩兩政黨分別集中在 1/6，1/2，5/6 的情形，另一例則為兩黨在 1/8，一黨在 3/8，一黨在 5/8，而另兩黨在 7/8 的位置。

我們如果把這些預測的結果運用在台灣的政治黨競爭經驗上，發現這個模型有一定的理論價值。以台灣近十年的政黨競爭從一黨獨大轉變成多黨競爭演變過程來看，當國民黨一黨獨大時，其意識型態立場不需要考慮到選民的

---

9. 選民的理想政策指的是每個選民心目當中最支持的政策位置。以統獨問題為例，如果把最獨和最統的立場分別定位在 0 與 1，則一個「完全中立」的選民之理想政策位置為 0.5。

需求，以領導者的意志為主要決定因素。而當民進黨勢力逐漸茁壯，國內政黨生態開始有兩黨競爭出現時，兩個政黨分別逐漸從統獨兩端向中間移動。這段期間亦有許多研究在探討國民黨和民進黨在路線上的趨中轉型。當新黨出現以後，由於其得票率有限，未能形成鼎足而三之勢，一直到兩年多前的總統選舉乃至於選後的親民黨成立之後，才成為三個主要政黨競爭的態勢，也造成了政黨路線上的不穩定。在二〇〇一年年底的立委選舉中，國民黨內始終有路線之爭，而親民黨和民進黨也都希望往中間靠攏，政黨之間定位的互動並不確定，又想往中間靠，又擔心失去邊緣的選票，符合 Eaton 和 Lipsey 對三黨競爭的預期。

而當台聯黨成立，在前年立委選舉初試啼聲，由於尚未發展成能夠威脅主要政黨的力量，因此在選舉時尚未有產生影響政黨政策定位的影響。但是在新的國會開議後三個月內，只有十三席委員的台聯黨在掌握議題的表現上非常突出，不管是在反對八吋晶圓廠開放登陸、限制總統候選人台生條款、閩南語列為官方語言、還是總統搭檔必須要同屬一政黨等問題上，都能夠造成話題，並得到民進黨傳統選民的支持。隨著台聯黨認同者的增加，未來台灣的政黨競爭會不會讓泛藍泛綠兩陣營中的政黨逐漸往 1/4 和 3/4 的方向聚集，值得後續的觀察，目前的跡象顯示出混合的訊息。一方面我們看到以陳水扁總統為首的力量在努力嘗試帶領民進黨往新中間路線轉型，另一方面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則強烈感受到台聯黨所帶來的選票壓力，也有一股必須要回應傳統支持者的需求呼聲，因而可以看到民進黨委員在「台灣正名」遊行中的身影。這兩種力量孰大孰小，還要看選舉的性質種類而定。由於在總統選舉時，台聯黨自行推出候選人的機會不大，因此兩組對決的機會遠大於多黨競爭，可是到了立委選舉時，就會有必須要鞏固基本支持者而偏離中間路線的需要，就有可能會往 Eaton 和 Lipsey 對四黨競爭的均衡解預測方向演變。局勢是否如此發展，有待未來時間的檢驗，但是這個簡單的模型卻提供了一個我們可以用來理解過去十年來台灣政黨競爭的理論架構。

如果我們回到模型本身來看，上述的模型，不但是對事實的極度簡化，

也做了許多可以再進一步討論的假設。例如說：

- (一) 政策面向可以是多維，<sup>10</sup>也可以是開放<sup>11</sup>的，不必然為單維的封閉空間。
- (二) 選民的分佈可以是對稱或不對稱的連續分佈，<sup>12</sup>而不是平均地分佈在數線上。
- (三) 選民可能會策略性投票而非真誠投票。<sup>13</sup>
- (四) 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認同因素完全被忽略，民眾只支持選舉時離自己立場最近的政黨。
- (五) 政黨可以不受過去想法行為拘束而在政策光譜上自由移動：政黨改變自己的傳統政策立場常需要付出代價。<sup>14</sup>
- (六) 選民無需求彈性，必須要投票給某一政黨，不能棄權。
- (七) 政黨移動位置時，可以假設其他政黨也會考慮到其移動的動作而做出相對應的回應（此假設稱為 Stackleberg 假設，意指假設賽局中的另一方，策略會隨著自己策略的改變而作出相對的回應改變）。

以上這些假設，都會使模型更加貼近現實狀況，對預測結果也都會有程度大小不一的影響。從建構模型的角度來看，在解釋力相同的情況下，簡單的模型優於複雜的模型。簡單的模型因為抓住了關鍵的變項，讓研究者能夠掌握問題的所在。以此模型為例，如果其運用在台灣政黨競爭的解釋和預測能力能夠令人接受，那就表示影響台灣政黨競爭定位的關鍵因素已經被該模

---

10. 多維指的是選民同時考慮不同面向的議題，例如統獨、經濟、改革等，無法全部化約在一個面向上。

11. 開放指的是政策空間不必然要限定在一個固定的區間之內，可以讓候選人及選民無限制地選擇自己最理想的位置。

12. 對稱或不對稱指的是選民在數線上的分布是否左右相對平衡；如果是不對稱的連續分布，可能中點左邊或是某一區塊的選民人數較集中，多於中點右邊或是其他區塊的選民。

13. 真誠投票指的是選民依照自己的偏好順序投票，不論程序或是最後的結果如何。策略性投票指的是選民會考慮投票程序以及其他人的偏好順序，來決定自己如何投票，以避免投票結果讓自己最不喜歡候選人當選。

14. 例如傳統支持者的抱怨、不投票、甚至於出走等。

型所掌握。如果其預測結果和現實的政黨競爭狀態有極大落差，就表示該模型遺漏了影響台灣政黨行為的重要變項，必須加以修正。而修正的過程，也提供了研究者重新檢視建構模型變項與邏輯的機會，對研究問題作更進一步的思考。這是理性抉擇模型可以幫助研究者理解政治的一個例子。模型的重點不在於其假設的合乎現實狀況或是對許多重要變項的遺漏，而是在於以關鍵性的變項來建構簡單的模型以掌握住研究問題的精髓。政黨存在的目的可能不只是为了極大化選票，還可能有宣揚理念和促進黨內民主等目的，任何模型都是對事實的簡化，但是這些簡化的過程不能妨礙到此模型的預測和解釋能力。

## 五、理性抉擇在政治學運用的探討之二——以投票率為例

另外一個例子則是研究投票率的問題。理性抉擇的模型對於選民為何要投票，無法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答覆，因而常成為學界抨擊理性抉擇理論缺失的範例。因此作者想要以學界對此議題的研究及其引發的後續實證研究為例，來討論理性抉擇的限制與貢獻。陳敦源（2000）曾經對人為何投票的問題，從理性抉擇觀點，在人們對該問題思考邏輯的文獻分析上，作了很詳盡的整理，並且以台灣實證資料對不同教育程度者的投票相對機會成本作比較，發現教育程度越高者，投票意願越高，並進而討論這個結果和理性抉擇模型的相容性。他建議研究者釐清多重與個人的投票動機，並且推廣投票所外民調（exit poll）以對該問題進行深入分析。本文限於篇幅的限制及關懷主題的差別，將作為較為精簡的敘述與整理，並將討論焦點放在相關解釋的推理邏輯及其所引發的後續實證研究，和探討理性抉擇學說應用在此議題的貢獻與限制上。

理性的選民會計算其投票成本和預期效用，來決定要不要投票，如果成本大於預期效用，則應該選擇不去投票。從投票成本來看，選民必須蒐集相

關資訊、承擔投票的交通費用和時間成本等，在美國還有事前登記（registration）的手續，都是選民必須要負擔的成本。從預期效用來看，則必須要同時考慮兩方面的因素，[投票所帶來的利益] 和 [個人一票會影響結果的機率]。預期效用等於 [投票所帶來的利益] 乘上 [個人一票會影響結果的機率]。投票所帶來的利益指的是不同的候選人當選，對該選民的差別。候選人之間的差異大小和選民支持某候選人的強度，都會影響選民對利益大小的認知。如果某選民認為候選人之間的差異很大，而且他又強烈支持某候選人的話，該選民的利益較大。但是預期效用的計算還要考慮到個人投票影響選舉結果的機率。在大型的選舉中，投票的成本要自己負擔，但是選舉的結果卻是眾人共同決定，自己的一票影響結果的機率趨近於零。換句話說，不管選民認為候選人之間差異多大或是其支持的強度多強，選民去投票的預期效用，在考慮了其選票的影響力之後（乘上一個趨近於零的機率之後），還是趨近於零的。如果人真是理性的話，考慮到投票所必須花費的成本以及個人投票影響選舉結果趨近於零的機率的話，選民是不應該去投票的。理論上的推理雖然如此，但是從事實的觀察來看，或許投票率高低有所不同，但是世界各國選舉中都有大量的選民出來投票，難道這些人都不理性嗎？

爲了要對此問題提供合理的解釋，學者們提出了下列的主張，希望說明選民爲何要去投票的原因（Blais, 2000）：

- （一）爲了維繫民主政治的運作（Downs, 1957）
- （二）基於公民的責任感（Riker and Ordeshook, 1968）
- （三）基於避免風險的考慮，擔心因爲自己沒投票而使得支持的候選人落敗，這是一種避免最大遺憾（minimax regret）的思考模式（Ferejohn and Fiorina, 1974）
- （四）考慮到也許其他人都不會去投票，所以自己的選票就變得更重要（Mueller, 1989）
- （五）受到所屬團體或政治人物的影響動員（Aldrich, 1993; Uhlaner, 1986, 1989a, 1989b, 1993）

(六) 投票的成本趨近於零，而且不去投票也有面對社會壓力的成本  
(Niemi, 1976)

(七) 選民不會去詳細計算低成本、低獲利的行爲，例如投票 (Barry, 1978;  
Aldrich, 1993)

這些補充說明也都無法完全令人滿意。在理性的計算中，一個人有沒有去投票，與民主政治能否維繫並沒有因果關係 (Barry, 1978)。如果別人都沒有去投票，自己的一票也無法維繫住民主；如果別人都去投票，自己不去投也不會對民主有所妨礙。

如果投票與否的決定是基於有無公民責任感，這樣的解釋實際上並沒有提供解釋，我們還必須要更進一步去探討爲何有些民眾具有公民責任感，而且是否其他因素如利益和成本等就變得較不重要。如果選民是爲了要避免事後造成最大悔恨的風險，那我們應該會看到當有極端的參選人出現時，投票率會因而提高的情形，事實上卻沒有發生 (Mueller, 1989)，而且選民會否有因爲擔心去投票時發生車禍的更大悔恨風險考量而不去投票的情形 (Beck, 1975)。

至於認爲因爲其他人可能不會去投票，所以自己的一票影響最後結果的機會會增加的解釋，只能有限度地提高投票的機率，只要其投票成本是正數，並且不確定其他人會棄權的話，理性的選民還是不會去投票 (Palfrey and Rosenthal, 1985)。而且如果其他人也這樣想的話，自己的一票還是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力。政治人物或團體的動員固然有助於降低成本，但是個人選票影響結果的機率還是很小，而且被團體動員的民眾畢竟還是少數。而且用對團體的歸屬感和認同作爲投票的理由，則又會落入稍早用公民責任感來解釋投票行爲的弊病。另外從投票的低成本來解釋民眾其實不會在乎，還是沒有處理民眾是否必須要高估其投票影響或低估其投票成本的問題，而社會壓力的解釋則還是必須假設民眾的投票是基於公民責任感。最後，關於民眾不會去計算低成本、低所得的行爲，則被批評爲是理性抉擇理論建構者主觀並選擇性地決定其理論運用的適用性。在能夠解釋的領域則可以運用，不能解釋的

地方則自我開脫（Green and Shapiro, 1994）。

綜合以上的討論，似乎理性抉擇理論無法對民眾為何投票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而這個議題也成為理性抉擇批評者攻擊的焦點之一。例如 Green 和 Shapiro 認為學界從理性抉擇模型對選民投票率的相關研究中無法得到任何啓示（1994: 68）。我們暫且不論事實上還有其他推導出高投票率均衡解的理性抉擇模型存在（Lohmann, 1994），單從以上「並不令人滿意」的許多模型而言，其推論過程就能夠幫助我們釐清原本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讓我們注意到用直覺無法想到的過程和問題，進一步釐清研究問題的邏輯，了解理性抉擇方法的優缺點和限制，並且衍生出可供檢驗的假設。例如 Blais（2000）就從以上的各種模型討論的過程中，以比較政治的觀點，來檢驗模型中所提及的各個變項對各國投票率的影響。結果發現，競爭越激烈的選舉確實投票率越高。而根據其進行的實證研究也發現選民對於自己的一票能夠影響最後結果的機率也都普遍有高估的情形。

在選民的成本部份，選民投票成本越高的選舉其投票率越低（Knack, 1994）。但是 Blais 也發現許多選民把投票時所需的時間及相關成本幾乎視為零，因而提高了投票的意願。而且有半數的選民把投票視為道德責任，如果沒去投票會產生罪惡感。在機率的部分，選民的一票影響結果機率越大時，整體投票率越高。實證資料顯示，在越重要的選舉和選情越激烈的選舉中，投票率越高，但是選民對自己一票能夠影響結果的認知和理性抉擇的假設顯然不符。民眾不是用 [利益乘上機率]<sup>15</sup> 算出來的期望值作為自己行為的思考準則，而比較像是用利益加上機率的方式來思考。選民會以政黨之間的差異作為投不投票的考量，但不會深思自己的一票影響結果的真實機率。換句話說，選民會高估自己選票的實際影響力。

從以上的研究發現中，我們可以看到理性抉擇模型的優缺點。這些模型所提出來影響選民投票與否的變項，如政黨之間的差距大小（選民認知的相

---

15. 這裡的機率指的是選民投這一票會影響選舉結果的機率。

對利益差距)、投票與否對結果的影響、投票的成本考量、以及公民的道德責任感等因素,都對整體的投票率有預期方向的影響。政黨之間差距越大、選舉結果越接近、投票成本越低、公民責任越高等,投票率也會越高。但是研究也發現,起碼在投票與否這件事情的考慮上,選民的思考方式和理性抉擇研究者的模型假設存在有相當程度的落差,選民對機率的主觀認知和客觀事實之間有相當大的差距存在。我們認為這個例子對理性抉擇在政治學的運用上至少有下列的啓示。

首先,理性抉擇的模型縱然不能對投票與否的問題提出全面性的滿意解釋,但是相關模型的探討過程已經讓學界能夠更嚴謹地推論思考相關變項的影響力,因此認為理性抉擇對增進相關問題的了解完全沒有貢獻的看法是有問題的。即使某些模型只是在陳述已知或已發生的現象,它們對於提供因果關係的解釋上還是有其貢獻。

其次,相對於其他的途徑或研究方法而言,理性抉擇在此問題上所提供的答案是相對較優的。其他從社會動員或資源分配面所發展出來的解釋理論令人更加無法滿意(Blais, 2000: 139)。理性抉擇模型分別探討影響民眾投票或不投票的原因,並且嘗試去解釋為何那麼多民眾會「違反自身利益」地去投票。這些嘗試讓我們能夠更全面地來探討理解相關問題。

第三,理性抉擇的模型在運用上有其限制。實證研究顯示,民眾在投票與否的決定上,並不像其他議題一樣這麼在乎。因為投票行為是一種低成本、低所得的行為。一方面選民的投票成本並不高,花費的時間有限,甚至會有民眾本身就對蒐集政治資訊感到興趣,另一方面不管其所做決定的對錯如何,對選舉結果造成的影響也有限。所以一個理性的民眾會寧願在買房子或買車子時做更多資訊的蒐集以助其決定,也不會花太多心神在投票的決定上。換句話說,這種低成本、低所得的行為本來就是理性抉擇理論在解釋上較明顯的弱點所在。因此,我們必須更進一步來思考界定理性抉擇最適合研究的領域。

## 六、結 論

如上所述，理性抉擇的運用有其限制，在某些領域的解釋力優於其他領域。例如 Satz and Ferejohn (1994) 認為理性抉擇的模型運用在分析公司的行為比分析顧客的行為適合、解釋政黨或政治人物的行為比解釋選民的行為適合。綜合學者們的看法，我們提出較適合運用理性抉擇模型的客觀條件 (Kelley, 1996; Taylor, 1996; Green and Shapiro, 1996)：

- (一) 行動者所面臨問題的可能選項有限：當行動者的選項極多或是能夠隨意地創造出新作法時，理性抉擇模型的預測解釋力就會下降。
- (二) 行動者很清楚其選擇所帶來的成本和利益，而且最好成本和利益的代價都很高，如此行動者會較重視其選擇所帶來的後果。
- (三) 當行動者要達到的目的及其偏好是很清楚時：如果行動者同時有多重目的或偏好順序不明，則理性抉擇模型較難預測其行為。
- (四) 當行動者對相關資訊越清楚時：如果行動者對環境整體的資訊了解越多，例如客觀的環境變化和對手的策略及偏好等，其行為越可能符合理性抉擇模型的預測。
- (五) 行動者能夠從結果中學習經驗並改正錯誤，而且整個競爭的環境並沒有複雜到超過行動者的認知能力範圍之外。

以上的這些條件界定了理性抉擇模型適合運用的情境。這種分類不是非黑即白的絕對標準，而是程度的問題。當模型的客觀環境越符合以上的條件，其行動者的行為就越可能符合理性抉擇模型的解釋和預測。就像任何研究方法一樣，理性抉擇的途徑有優點，也有其受限制之處。

理性抉擇模型發展到現階段，已經成為政治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學門，短期之內看來也沒有衰微的跡象。批評理性抉擇運用的學者必須要正視其貢獻，不能一味以偏蓋全地認定人們不是理性的行動者。但是理性抉擇方法的運用者也必須要面對其方法的缺失，不能誤以為其方法上優於其他的研究途

徑，而必須要了解到其運用上的限制和先天的缺點並設法加以改善。作者認為理性抉擇模型在現階段至少有下列兩個重要問題有待努力：

第一、理性抉擇的研究者偏重於理論的建立而較忽略實證資料的檢證，以至於建構了相當多的模型，但是卻缺乏對模型實際效用的評估。如果理性抉擇途徑希望能夠對我們了解政治行為有更多的貢獻，就必須要更重視其模型與現實狀況的連結。

第二、理性抉擇的運用者必須要加強與其他領域研究者的互動溝通，才能擴大其方法的被接受度。透過不同研究方法的對話，各領域的學者都能夠進一步了解其方法的優缺點。目前似乎有理性抉擇學者形成較為封閉領域的趨勢，因此理性抉擇的運用者必須要盡量使自己的研究能夠有更大的讀者群，以簡要的敘述而非艱澀的數學公式來說明其模型的推理邏輯。否則方法上的精進和複雜化反而可能會造成其研究接受度和影響力的窄化。

總結來說，學界對於理性抉擇的批判，有誤解之處，也有切中要點的地方。人們的偏好順序，不見得都能夠用理性抉擇的假設來建構模型。理性抉擇的相關模型，在運用上有其較為適合的客觀條件，也有其無法提供理想答案的盲點所在。我們認為理性抉擇研究途徑提供了政治學界另外一個了解政治行為的研究方法，是其他研究方法無法提供的。他們用嚴謹的推理和邏輯，以簡化的模型來解釋並預測社會現象。但是這些方法並不能普遍運用來分析所有的社會現象，就像任何其他的研究方法一樣，因此理性抉擇模型運用者也要了解該方法的限制。所以回到本文的焦點，政治學是理性的嗎？我們認為絕大部分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理性卻不是政治學的全部，政治學和其他的社會科學行為都有其非關理性的一面，而理性抉擇的研究因此也有其先天的限制。各領域之間應該增加彼此之間的對話溝通，了解其他領域研究方法的優劣。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政治學是否理性，而是政治學的哪些部分是理性的？不理性或非關理性的部分是哪些原因所造成的？這樣的研究方向，比探討政治學是否理性更能夠幫助我們了解政治行為。

## 參考文獻

- Abelson, Robert P. 1996. "The Secret Existence of Expressive Behavior." in Jeffery Friedman ed. *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 Economic Models of Politics Reconsidered*. Yale University.
- Aldrich, John H. 1993. "Rational Choice and Turnou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 246-78.
- Almond, Gabriel. 1977. "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in Gabriel Almond ed.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s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rbury Park, Cal.: Sage Publications: 32-65.
- Arrow, Kenneth J. 1951.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arry, Brian. 1978. *Sociologists, Economists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ck, Nathaniel. 1975. "The Paradox of Minimax Regre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9: 918.
- Blais, Andre. 2000. *To Vote or Not to Vote: The Merits And Limit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Chong, Dennis. 1996. "Rational Choice Theory's Mysterious Rivals." in Jeffery Friedman ed. *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 Economic Models of Politics Reconsidered*. Yale University.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Eaton, B. C., and R. Lipsey. 1975. "The Principle of Minimum Differentiation Reconsidered: Some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Spatial Competi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2: 27-49.

- Elster, Jon. 1986. ed. *Rational Cho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Ferejohn, John A., and Morris P. Fiorina. 1974. "The Paradox of Not Voting: A Decision Theoretic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525-46.
- Friedman, Jeffery. 1996. "Introduction: Economics Approaches to Politics." in Jeffery Friedman ed. *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 Economic Models of Politics Reconsidered*. Yale University.
- Friedman, Milton. 1953.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odin, Robert E.,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1996.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een, Donald P., and Ian Shapiro. 1994.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96. "Pathologies Revisited: Reflections on Our Critics" in Jeffery Friedman ed. *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 Economic Models of Politics Reconsidered*. Yale University.
- Harsanyi, John C. 1986.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Rational Behavior." in Jon Elster ed. *Rational Cho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Hausman, Daniel M. 1992. *The Inexact and Separate Science of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telling, H. 1929. "Stability in Competition." *Economic Journal* 39: 41-57.
-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263-91.
- . 1984.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341-50.
- Kelley, Stanley Jr. 1996. "The Promise and Limit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 Theory.” in Jeffery Friedman ed. *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 Economic Models of Politics Reconsidered*. Yale University.
- Knack, Stephen. 1994. “Does Rain Help the Republicans? Theory and Evidence on Turnout and the Vote.” *Public Choice* 79: 187-209.
- 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ohmann, Susanne. 1996. “The Poverty of Green and Shapiro.” in Jeffery Friedman ed. *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 Economic Models of Politics Reconsidered*. Yale University.
- Lowi, Theodore J. 1992. “The St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How We Become What We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1-8.
- Martin, Lisa L. 1999. “The Contribu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2: 74-83.
- Moon, Donald J. 1975. “The Logic of Political Inquiry: A Synthesis of Opposed Perspectiv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I: Science: Scope and Theory*.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31-228.
- Morrow, James. 1994. *Game Theory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ueller, Dennis C. 1989. *Public Choice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iemi, Richard. 1976. “Costs of Voting and Nonvoting.” *Public Choice* 27: 115-19.
-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lfrey, Thomas R., and Howard Rosenthal. 1985. “Voter Participation and Strategic Uncertain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 62-78.

- Posner, Richard A. 1985.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Criminal Law." *Columbia Law Review* 85: 1193-1231.
- Quattrone, George A., and Amos Tversky. 1988. "Contrasting R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 3.
- Riker, William H. 1990. "Political Science and Rational Choice." in James E. Alt and Kenneth A. Shepsle eds.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ker, William H., and Peter Ordeshook. 1968. "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25-43.
- Rothschild, K. W. 1946. "The Meaning of Rational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4: 50-52.
- Satz, Debra, and John Ferejohn. 1994. "Rational Choice and Social Theory." *Journal of Philosophy* 91: 71-87.
- . 1996. "Unification, Universalism, a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n Jeffery Friedman ed. *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 Economic Models of Politics Reconsidered*. Yale University.
- Simon, Herbert A. 1993. "The State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Lowi's View of Our Disciplin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6: 49-51.
- Taylor, Michael. 1996. "When Rationality Fails." in Jeffery Friedman ed. *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 Economic Models of Politics Reconsidered*. Yale University.
- Uhlener, Carole J. 1986.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ational Actors, and Rationality: A New Approach." *Political Psychology* 7: 551-73.
- . 1989a. "Rational Turnout: The Neglected Role of Group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 390-422.

- . 1989b. “Relational Goods’ and Participation: Incorporating Sociability into a Theory of Rational Action.” *Public Choice* 62: 253-85.
- . 1993. “What the Downsian Voter Weighs: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Action.” in Bernard Grofman ed. *Inform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hoice: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in Perspectiv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Waldo, Dwight. 1975. “Political Science: Tradition, Discipline, Profession, Science, Enterprise.”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I*.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130.
- Walt, Stephen. 1999. “Rigor or Rigor Mortis?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4: 5-48.
- 石之瑜。1999。〈William Riker 的理性概念試評——理論分析架構的探討〉。《美歐季刊》13, 3: 229-260。
- 何高潮。1995。〈理性選擇方法與中國政治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6: 89-114。
- 李允傑。1996。〈邁向整合的新制度學派研究途徑：評論政策過程研究的相關模型〉。《空大行政學報》5: 301-326。
- 吳玉山。2000。〈政治與知識的互動：台灣的政治學在九零年代的發展〉。何思因、吳玉山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學》: 3-48。台北：中國政治學會。
- 吳宗憲。2000。〈天安門事件後中共留學生政策的演變——以理性選擇研究途徑分析〉。《中共研究》34, 1: 83-93。
- 吳秀光。1998。〈由理性抉擇途徑談行政革新〉。《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報》2: 191-213。
- 袁頌西。1981。〈當代政治學中的解釋問題：實徵論與詮釋學之論爭〉。《政治學報》9: 53-105。

- 徐振國。2002。〈政治學方法論偏頗發展的探討〉。《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123-178。
- 黃乃熒。1994。〈比較行動理論、理性選擇與經濟理論三個典範在教育政策分析的啓示〉。《中學教育學報》1：15-32。
- 黃瑞祺。1992。〈方法論個體主義、理性選擇、與馬克思主義〉。《東海社會科學學報》11：477-503。
- 陳敦源。2000。〈人爲何投票？—理性選擇觀點的緣起與發展〉。《民意研究季刊》212：31-64。
- 。2001。〈新制度論的範圍與方法——一個理性選擇觀點的方法論檢視〉。《行政暨政策學報》3：129-184。
- 傅恆德。1993。〈集體政治暴力的剖析：理性抉擇理論的觀點〉。《東海學報》34：395-412。
- 張彬村。1999。〈明清時期寡婦守節的風氣——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問題〉。《新史學》10，2：29-76。
- 張漢音。1993。〈關於犯罪研究的新理性選擇模式之初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3，2：244-256。
- 蔡政諭。2000。〈一九五〇年韓戰美國臺海政策轉變之研究--國家利益的理性選擇〉。《軍事史評論》7：97-117。
- 謝復生、牛銘實、林慧萍。1995。〈民國八十三年省市長選舉中之議題投票：理性抉擇理論之分析〉。《選舉研究》2，1：77-92。

# A Discus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Emile C.J. Sheng\*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s widely applied in the research of political science, especially in areas such 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gotiation, voting behavior, collective action, legislative politics, and party competition. Articles applying rational choice methods are also increasingly published in leading journals. However, there are skeptics questioning whether people do engage in rational thinking during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re are also scholars who argue that rational choice models fail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explanations, and have no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behavior. Some of these critiques are right on target, yet others arise out of misunderstanding.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ome of the major critiques and responses to 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and attempts to illustrate its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rough two examples, party competition and voting turnout. The debate should not be focused on whether politics are rational, but rather on defining the areas that are better suite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Key words:** rational choice, party competition, voting turnout, rational assumption.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E-mail: esheng@seed.net.tw

